

立信会计学术专著

LIXIN ACCOUNTING
ACADEMIC MONOGRAPH

非生产性支出

——基于寻租观与代理观的解释

万华林 /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立信会计学术专著

非生产性支出：基于 寻租观与代理观的解释

万华林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生产性支出：基于寻租观与代理观的解释 / 万华林著.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1. 7

（立信会计学术专著）

ISBN 978-7-5429-2937-2

I. ①非… II. ①万… III. ①企业管理：成本管理—研究 IV. ①F27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6140 号

责任编辑 黄成良

封面设计 周崇文

非生产性支出——基于寻租观与代理观的解释

出版发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电 话	(021)64411389	传 真	(021)64411325
网 址	www.lixinaph.com	电子邮箱	lxaph@sh163.net
网上书店	www.shlx.net	电 话	(021)6441107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9.75	插 页	1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5429-2937-2/F		
定 价	24.00 元		

如有印订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本书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790242)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会计)建设项目(编号:J51701)

上海市会计学教育高地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编号:11ZS187)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0SG54)

会计是一门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学科。回眸会计的发展史,会计学科始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实现理论的突破和实践的创新。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国际化以及会计的国际趋同,为会计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并形成了会计研究的累累硕果。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博士开创的立信会计事业,以诚信会计思想而享誉海内外。进入新世纪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立信会计学术专著”系列展示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选题涉及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的主要前沿领域,内容着重引介和评价这些领域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创新,并试图对这些领域的理论发展与方法创新有所贡献,从中也体现了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学科正在形成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突出应用,直接服务于国家与上海地方经济的研究特色。

学术研究的魅力在于发展与创新,“立信会计学术专著”系列所追求的是能够对会计理论有所发展,对会计方法有所创新,哪怕所进行的发展与创新是十分微小的。如果列入“立信会计学术专著”系列出版的每本专著都能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与方法的创新有所贡献,能够得到同行的一点认同,也算达到了我们编辑出版“立信会计学术专著”系列的目的了。

邵瑞庆

2011年7月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体制。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与此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并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本研究试图结合理论和中国制度背景,研究企业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生产性支出如何随制度环境或契约形式的变化而不同,又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非常重要、但又缺乏足够研究积累的问题。基于不同性质企业面临的不同产权约束和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地区差异,作者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以及不同地区政府干预、政府服务以及产权保护等治理环境差异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总体而言,寻租理论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而代理理论解释力相对较弱。这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是相对内部激励更为首要的问题。这一发现对认识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治理环境因素也对企业寻租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而言:
① 地区制度环境越好,企业非生产性支出越少,表明制度差异确实影响了企业寻租成本;同时,企业寻租能力差异对企业寻租成本也有显著影响;
② 制度因素对非国有企业寻租成本影响更大;同时,国有企业中非保护性行业寻租成本受到制度因素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确实对企业交易成本形成了统计上可以观测的影响,并且这

一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不尽一致。

最后，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系统地影响了企业组织内部交易成本——高管在职消费。具体而言：①国有企业薪酬管制越严重，经理人在职消费水平越高，并且受到管制的薪酬契约缺乏激励效率；这表明，与管制者的初衷相反，薪酬管制诱发了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②但是，在不同条件下，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并不相同。薪酬管制在保护性行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中影响较大；而在非保护性行业和政府间接控制的企业中，薪酬管制诱发的在职消费较少；但在保护性行业和政府间接控制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却较小。这意味着不同条件下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可能存在差异。

本书为研究经济转型条件下我国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效果提供了实证支持。本书也从更基本的制度层面对公司非生产性支出进行了研究，拓展了以往的研究；同时，本书在度量非生产性支出方面的探索也为今后该领域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本研究也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为有关决策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基础。

本书部分内容已公开发表于学术期刊，其中与陈冬华、陈信元合作的《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发表于《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全文转载于《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国外在职消费研究述评》发表于《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9期；与陈信元老师合作的《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基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研究》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9卷第2期（2010年1月）。由于期刊论文和书本在内容体系上存在一定差异，研究设计也有所不同，难以一一对应地指明上述内容在本书中的章节。本书在总体框架上仍保持了博士论文的原貌，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同时也更正了原文的个别错漏。

万华林

2011年7月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 内部交易成本：在职消费角度	4
2 外部交易成本：寻租成本角度	6
第 2 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1 交易成本、代理理论与契约安排	11
2 在职消费的相关研究	14
3 管制、寻租与企业寻租成本	21
4 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25
第 3 章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28
1 经济转型与地区市场化进程	28
2 权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企业寻租	33
3 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	39
第 4 章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变量设计	47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47
2 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及有效性检验	50
3 非生产性支出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与变量设计	60
第 5 章 非生产性支出：初步证据与总体分析	67
1 企业寻租与薪酬管制的描述性分析	67
2 非生产性支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72
3 关于主要影响因素的拟合度分析	84

第6章 进一步分析与敏感性测试	87
1 非生产性支出：基于寻租观的进一步分析	87
2 非生产性支出：基于代理观的进一步分析	95
3 敏感性测试	101
第7章 非生产性支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102
1 非生产性支出与公司价值	102
2 进一步分析与敏感性测试	107
第8章 总结	114
1 研究发现与研究创新	114
2 理论与政策含义	116
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117
附录1 我国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进入管制相关规定	119
附录2 国务院规定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	121
附录3 单位负责人、专有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部分职业工资指导价位(分行业一)	125
附录4 深圳市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实施办法	126
参考文献	130
后记	143

以 Coase(1937)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张五常(1987)将交易成本视作一种“制度成本”,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并且“除那些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外,社会中所有可以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同时,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的存在和变化也被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并且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①。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交易成本,而在现代社会中专业化的利益巨大,交易成本作为专业化利益的一个比例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却各不相同,张五常(1998)认为,“这个尺度(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们看到的各国财富的差别”;同时,“这一比率稍微下降一点,就会使财富大大增加”。埃格特森(2004)指出,由于高额的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故对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组织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交易成本不仅影响了生产的契约安排,而且影响着人们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Wang, 2003)。因此,研究企业交易成本如何随着制度环境或契约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又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对社会价值创造的意义并不相同。本研

^① 张五常认为,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宾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究认为,从市场微观结构出发,企业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分为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Spulber,1999)、企业组织内部契约决定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受到管制者施加的额外成本。不同的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① 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主要由技术进步及市场结构演化所决定,体现为市场上寻找价格分布、商品质量和劳动投入的信息,以及在市场上寻找潜在获利机会、订立契约以及监督契约执行的成本等,这类成本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建立中间层组织予以降低,对处于同一市场体系下的所有企业都具有同等影响,并且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签约对象,以将这种交易成本降至最低;同时,由于价格机制作为“无形之手”,可以有效地协调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Smith,1776),因而上述成本可能并非影响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② 企业组织内部契约决定的成本,也就是代理成本。埃格特森(2004)认为,“当资源所有者的联合代替了一系列的单一型企业,一种交易成本就被另一种所代替:由一项交易代替一系列市场交易时,市场之内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但出现了新成本类型,即形成和维持生产者联合的交易成本——通常在文献中被称为代理成本。”这种交易成本无法通过建立中间层组织的方法予以消除,是一种契约签订后的成本,源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③ 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受到管制者(政府)施加的额外成本。与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不同,这类成本具有特定性,即企业作为交易一方无法自由选择交易的另一方——政府,除非企业不进入市场;同时,这种交易成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可能并不相同,当政府以资源配置者身份出现时,这一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的寻租成本^①。已有研究表明,这类成本(如等待成本、获得经营行业许可的成本、贿赂官员的成本等)在经济转型国家显得更为重要(Dagnino 和 Farina,1999)。

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构成一种成本,但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不可能是无成本的,企业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上述成本,因而它甚至构成了社会价值创造的一部分;同时,竞争的存在和市场结构的自发演进都使得上述交易成本在既定的技术约束条件下达到最优,因而并非本书的研究对象。相对而言,后两类成本(企业的寻租成本和代理成本)则非社会价值创造所必须,主要体现为财富的

^① 当然,政府作为管制者还可能导致企业其他成本的增加,例如要求企业进行强制披露可能增加了企业与披露有关的各项成本,但本书不研究这类成本。

再分配,构成社会的一种非生产性支出。另外,这类支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因此,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后两类交易成本:公司的代理成本和寻租成本。

尽管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广泛存在,学术界却很少对非生产性支出给出定义。从政府支出角度看,生产性支出是指那些能够为私人生产部门生产性活动提供服务的支出,而非生产性支出是指那些对私人经济没有直接影响的支出(Aschauer,1998)。Bhagwati(1982)认为非生产性活动是一种“不产生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效用的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依据前述概念,本研究把非生产性支出定义为那些从社会生产角度看,不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产生商品或服务的支出。因而,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可视为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之外的所有非生产性成本^①。其中,代理成本为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契约能否及多大程度上有效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寻租成本可视为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主要取决于宏观制度因素(法律保护、金融市场以及腐败和社会资本等)的影响。

非生产性支出在我国也具有现实重要性,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盛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生产性支出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的估计,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高达3700亿元,占当年GDP的2.27%^②。由于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公款吃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或寻租成本。Cai,Fang和Xu(2005)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娱乐餐饮费用占企业工资总额的20%,占销售收入的2%~3%。这些支出除用于建立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外,也被用于经理人的个人消费或作为公司支付政府官员“保护费”或“贿金”的手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和寻租成本在中国都是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表现形式,前者反映了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后者则反映了公共治理对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的影响,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重要性,但在我国又缺乏深入研究。

① 必须指出,本书研究的对象为“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但为使行文简洁,后文“企业非生产性支出”通常又简称“非生产性支出”,这一简化不会引起歧义。

② 2007年3月,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刘光复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发言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数据,他列举了官员公务支出严重浪费的五大形式,其中我国招待费每年支出达数千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在教育上的支出;每年公款出国旅游考察花费2000亿元人民币。

1 内部交易成本：在职消费角度

薪酬契约是公司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公司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Berle 和 Means, 1932), 利益冲突难以避免, 薪酬契约是为解决公司两权分离下代理问题而对高管进行激励的一种契约安排。广义而言包括货币薪酬、经营者持股、在职消费等, 在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下还应包括政治升迁或职业升迁等其他契约安排。

在薪酬契约研究中, 关于货币薪酬、经营者持股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代理理论文献认为, 给定薪酬契约所包含的各种激励, 管理层将按照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Baiman, 1990)。大量文献表明薪酬契约会显著影响管理者决策行为^①, 这意味着管理层薪酬会影响公司治理和代理成本; 同时, 许多研究也表明公司治理会影响薪酬契约^②。关于管理层持股, Berle 和 Means(1932)、Jensen 和 Meckling(1976)认为代理成本与管理层持股负相关^③, Fama 和 Jensen(1983)则指出管理层持股达到一定数量可能造成侵占效应。Morck, Shleifer 和 Vishny(1988)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但亦有文献指出, 生存竞争使公司选择最适合本公司的股权结构, 因而企业绩效与高管持股无关(Demsetz, 198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职消费作为薪酬契约的一部分则在多数相关文献中限于理论的论述, 对在职消费的经济原因及其后果缺乏明确的界定, 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匮乏。已有文献中, Smith(1776)实际上把在职消费视为代理成本的一部分, 认为在职消费是由于高管人员的“疏忽和挥霍”, 源于高管与股东利益的不一致。此后的财务学文献中, 在职消费通常也被认为是经理人代理问题的体现(如 Grossman 和 Hart, 1980;

① 如投资决策(Larcker, 1983; Chen 和 Clark, 1994)、并购决策(Lewellen 等, 1985; Tehrani 等, 1987)、定价决策(Gordon 等, 1986)、权益债务互换决策(Defeo 等, 1989)及财务会计选择(Zmijewski 和 Hagerman, 1981; Healy 等, 1987)等。

② 其中经典研究包括 Core, Holthausen 和 Larcker(1998)、Lambert 等(1993)、Boyd(1994)、Finkelstein 和 Hambrick(1989)、Hallock(1997)等对高管与董事会结构关系的研究, 以及 Holderness 和 Sheehan(1988)、Allen(1981)、Lambert 等(1993)对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

③ Berle 和 Means(1932)指出, 当管理层仅持有少量公司股权, 股东又太过分散以致无法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时, 公司资产可能被用于造福管理者而非股东。Jensen 和 Meckling(1976)认为管理者持股减少将导致代理成本增加, 因而管理者持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Jensen 和 Meckling, 1986)。Berle 和 Means(1932)从股权分散角度论述了在职消费的成因,而 Jensen 和 Meckling(1976)则首次从委托代理关系角度论证了在职消费的必然性。Alchian 和 Demsetz (1972)则从信息成本角度阐释了在职消费的内生性。与前述观点不同,效率观认为公司从在职消费中获得的利益甚至可能超过高管个人获得的利益。Rajan 和 Wulf(2004)认为,公司为经理人提供在职消费的目的在于提高经理人效率,或者强化经理人地位与权威。

尽管对在职消费的研究总体较为匮乏,但高管人员在职消费在各国公司中都一定程度上存在,并且有其存在的必然性(Rajan 和 Wulf, 2004)。在中国,尽管缺乏十分准确的在职消费数据,但根据公开数据披露来看,在职消费总额非常惊人。2001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89%的企业经营者公开年收入低于10万元,50%以上国有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仅0.2%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一些企业经营者的在职消费随意性强,过多过滥,甚至处于失控状态,经营者的职位消费水平一般在其工资收入的10倍以上^①。根据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的一项调查,经营者专车消费(包括司机、维修保养、折旧、油耗、车位等相关费用)每年一般在15万元以上,企业高管的年均专车消费高达15万元。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的研究与前述结果相近,他们对1999—2002年之间的公司在职消费总额和经理人薪酬总额的比较,发现不论是按照中位数还是均值进行比较,经理人的报酬均远远小于在职消费,平均只占1/10左右。

以上分析表明,在中国,国有企业在在职消费是一个理论上缺乏足够研究、实际上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薪酬管制,相对西方成熟市场中完全市场化的薪酬契约而言,非货币薪酬本身更具重要性。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是我国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因而,研究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薪酬契约如何影响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公司价值,也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这是本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

① 转引自《市场报》记者李旭红2003年9月12日《国企老总要拿年薪了》一文。

2 外部交易成本：寻租成本角度

在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各地区市场化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也逐步显现，寻租成为一个被学术界与公众广泛关注的对象。据报道，1992—2002年10年间，因腐败而被查处的县级以上官员数量每年高达数千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寻租问题的严重。尽管不同学者对我国租金收益与租金规模的估计不尽一致，但都令人震惊（胡鞍钢，2004；齐仲锋，2006等）。这表明，我国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的色彩并未褪尽，企业的成本中，还蕴含着如何与政府及政府官员进行交易以获取更多资源，或以更为有利的价格获取资源这一重要交易成本。Cai等（2005）的研究首次涉及了政府行为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以系统地影响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陈晓、李静，2001；陈冬华，2002）^①；同时，由于各地市场化进程不一、治理环境有别，地方政府对公司的干预方式和力度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并对公司治理和公司价值形成了可观测的影响（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夏立军、方轶强，2005）^②。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造成了可观测的影响，因而可以预期，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会影响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另外，治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公共治理变量，也可能会系统地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并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由于公共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治理环境的改善不仅影响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从宏观上影响着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这是第二个研究出发点。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薪酬管制以及治理环境因素对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并研究何者更为重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然而，要实证研究上述问题，就难以回避该如何度量非生产性支出，目前该领域研究的缺乏也部分地归因于度量的困难。而度

① 陈晓和李静（2001）研究发现，为了在资本市场中争夺资源，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上市企业进行了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陈冬华（2003）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补贴收入。

② 夏立军、方轶强（2005）研究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程度以及法治水平高低都会影响公司价值，并且这种关系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且这一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同。

量之所以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在职消费还是寻租成本,作为企业的一种隐性薪酬或支出,与其他正常经营支出本就难以区分;同时,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的寻租成本也在技术上难以区分^①,这也决定了需同时研究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寻租成本。另一方面,即使某些项目能够近似地反映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但由于这些支出的“灰色”属性,企业缺乏披露的积极性,因此许多上市公司年报对办公费、差旅费以及经理人的小汽车等项目均言之不详。鉴于以具体报表项目衡量非生产性支出会遇到选择性披露等问题,我们试图通过计量经济方法从边际上区分交易成本的大小。由于研究的是非生产性支出,而企业营业管理费用最有可能包含这一成本,我们从营业管理费用出发,试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大小进行区分。基于研究目的,剔除与企业正常经营和组织活动有关的费用,从而计算出企业“营业管理费用”的超额部分,采用上述途径试图探索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的方法^②。

在解决了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后,本书试图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1) 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经理人薪酬管制是否影响了经理人在职消费?在不同条件下又有何差异?

2) 因市场化程度差异而产生的寻租行为是否影响了公司的非生产性支出?如果是,又是如何受影响的?在不同条件下又有何差异?

3) 影响非生产性支出的诸因素中,代理成本与企业寻租问题究竟哪个更为重要?对股东财富有何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作者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非生产性支出估计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基于交易成本的理论视角,对我国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进行实证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基础。

作者研究思路概括如下:

^① 例如,企业以为少数官员报销差旅费的形式支付“贿金”,这从会计项目上就难以和高管在职消费区分。

^② 张五常(1987)指出,交易成本常常难以度量,但只要我们能够指出这些成本在不同的可观察到的条件下是如何变化的,就可以避开度量问题,而且从边际变化的观点来看,也就可以区分其不同的类型。本书的方法与此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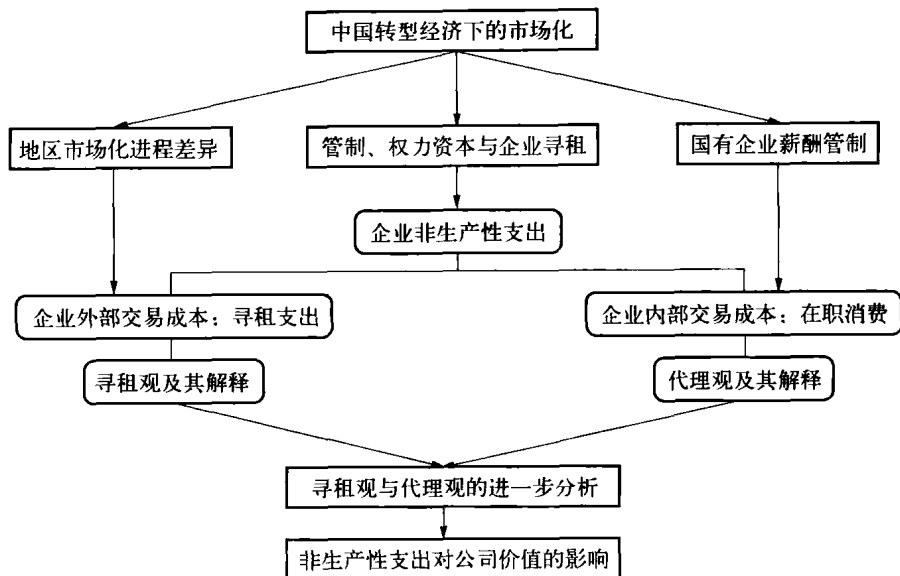


图 1-1 主要研究框架

本研究发现,从在职消费来看:① 国有企业薪酬管制越严重,经理人在职消费水平越高,并且薪酬契约越缺乏激励效率;这可能表明,与管制者初衷相反,薪酬管制诱发了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② 但是,在不同条件下,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并不相同,薪酬管制在保护性行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中,会诱发更多在职消费;而在非保护性行业和政府间接控制的企业中,薪酬管制引发的代理问题相对较弱。这意味着薪酬管制尽管诱发了国有企业高管更高的在职消费,但不同条件下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可能存在差异。而从寻租成本来看:① 地区制度环境越好,企业非生产性支出越少,表明制度差异确实影响了企业寻租成本;企业寻租能力差异对企业寻租成本也有显著影响;② 制度因素对非国有企业寻租成本影响更大;同时,国有企业中非保护性行业寻租成本受到制度因素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确实对企业交易成本形成了统计上可以观测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不尽一致。最后,从寻租成本与在职消费的相对重要性看,本研究发现寻租观能更好地解释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同时,尽管非生产性支出总体而言负面影响了企业绩效,但在不同条件下影响不尽相同。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利用中国地区间市场化和宏观